

PE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DANIEL W. BROMLEY

SUFFICIENT REASON

VOLITIONAL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充分理由

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

[美] 丹尼尔·W. 布罗姆利 著

简 练 杨 希 钟宁桦 译 姚 洋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对经济制度——包括一个经济的社会习俗、日常规则以及权利体系（产权关系）——的标准分析中，经济学家们使用了与分析个体行为相同的理论。在这本富有创新性的书中，丹尼尔·W. 布罗姆利挑战了这些理论，并主张代之以“能动的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思考经济制度演化的可行方法。经济一直处在调整的过程中，而本书是一个关于它如何调整的理论。

没有书能与这一本相比——它是一次重要的对于实用主义的现代阐释。

——沃伦·塞缪尔斯，密歇根州立大学

布罗姆利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富有启发性并且实用的关于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相关的文献经常牵涉到属于正统理论或是非正统理论这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布罗姆利教授的这套方法填补了其间巨大的空白。

——史蒂文·G.米德玛，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我们都知道福利经济学决不只是成本—收益分析，但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敢于尝试突破。而丹尼尔·布罗姆利的新书《充分理由》就是这样一次尝试。书中告诉我们实用主义如何能帮助我们运用经济学对政策进行分析。这项成果为一种新的制度福利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而且见解深刻的基础。

——戴维·科兰德，明德大学

上架建议：经济理论

ISBN 978-7-208-07391-3



9 787208 073913 >

定价：32.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PE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DANIEL W. BROMLEY

SUFFICIENT REASON

VOLITIONAL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充分理由

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

[美] 丹尼尔·W. 布罗姆利 著

简 练 杨 希 钟宁桦 译 姚 洋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美)
布罗姆利(Bromley, D. W.)著;简练,杨希,钟宁桦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Sufficient Reason: Volitional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ISBN 978-7-208-07391-3

I. 充… II. ①布…②简…③杨…④钟… III. 经济
制度-研究 IV. F0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477 号

责任编辑 刘林心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充分理由

——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

[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 著

简练 杨希 钟宁桦 译

姚洋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234,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391-3/F·1677

定价 32.00 元

中文版前言

用自己的母语来理解一本外国的哲学著作是极度困难的,其原因有二:

其一,如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提醒过我们的,作为反映(生活)的工具,语言在不断的演化。人类生活的核心,就是观察,并就观察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加工,然后再加以适应。人类与他自己的语言共同演化。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还认为,我们的语言在我们世界终止的地方终止,而我们的世界也在我们语言终止的地方终止。我们对于那些与自己不发生关系的事物,并没有对应的语言。因此,与我们无关的事物,也不可能拥有用来描述它们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以人类事务为目的而服务的,能够用于日常事物,是对语言的巨大奖励。当然,语言也可以是十分美丽或有启发性的,中国的古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相比之下,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与语言的使用联系更多。因此,一本哲学著作就不可避免地要我们把本来十分平实的语言去用于解说一个带着深刻反思性的、本原性的问题,而语言却一般并不随着这种研究问题的目的而对对应有所演化。

其二,由上面一点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人对于语言(甚至对于他们的母语)显得没有耐心。因为语言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反映、复制现实而已——它只是一个工具——因此,当我们遇上必须要停下来并思考我们所用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沮丧。一个木匠只想要一

个用起来感觉还不错的锤子，能够相当省力地把钉子钉上。木匠并不希望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他的锤子，或者其他的什么工具本身。他希望只是把工具拿起来，用于某个具体的任务，用完了再放到一边。而本书却要求读者对句子（语言）做仔细的思考——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句子阅读起来是相当费力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人只是希望轻松地阅读，而不是去真正反思他们所阅读内容的深刻含义。

当一部哲学著作从一种文字翻译到另一种文字的时候——即便这一工作是由一个出色的翻译家完成的——上面那一问题无疑就更加突出了。考虑到这一点，我为读者即将面临的艰难阅读任务表示同情。为了给读者减轻一些负担，请允许我提供少许帮助。我引用一句中国的名言作为开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短短的句子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类事物的目的上。如果你是甘肃省的一个农民的话，养猫的目的是为了抓老鼠；而若你是一个居住在上海的豪华高层公寓里的高级白领，你可能是希望你的猫更漂亮，或者在客人面前更乖巧。那么，什么是养猫这一行为背后的目的呢？目的取决于养猫的人是谁。因此，阅读《充分理由》一书的第一个提示就是：要明白，目的对所有人类行为的核心重要性。对目的的探求总是能对观察到的现象的理由有提示意义。我告诫我的学生：“永远不要停止问‘为什么’。”我们必须问，事情为什么是它所看起来的那个样子，而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是，实用主义在认识论上是遵循“溯因法”。溯因为“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为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时刻记在我们的脑中。因此，第二个提示就是要明白演绎法（deduction）、溯因法（abduction）和归纳法（induction）之间的深刻区别。请特别注意这三种确立信念的方法在逻辑结构之间的区别。

第三个提示是，我们必须摒弃这样一种想法，受过教育的人群——比如科学家们——总有正确的（或最好的）答案。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然而在它获得年轻的科学称号之后的短短几十

年间,它已经显露出一种与它的认识方法所不相称的、无法支持的过分信心和自我肯定性。经济学之所以变得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它把自己局限在有趣的经济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它似乎有提供答案的工具。而对那些它没有清晰意见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回答是:它们是“非经济学的”。也许它们属于历史学或者社会学关注的范畴?而实用主义的实质则是,我们必须对(人类)行动的多种不同理由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那种认为任何人的动机都是单一的这种信念。我们需要去询问他们的目的和兴趣所在,而不仅仅是断言他们的目的和兴趣。

第四个提示是,西方经济学只是看待物质供给问题的一种角度而已。这也许是最难以接受的一个提示。中国在贫困中挣扎已如此之久,只是在最近才选择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就突然发现了祖辈所无法想象的繁荣。这一急速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不少人把这种转型成果看作是如魔术般的神奇,因此也很容易想象市场也具有魔法般的神奇效力。请千万不要被过去 20 年的历史所愚弄。经济激励的引入的确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就是对中国面临的每一个问题的包治百病的万能答案。

第五个提示是关于市场中的经济制度的。也许,体会到市场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结构体系相配合会很令人惊讶。也的确存在一种倾向,把市场看成是法律和规制这套体系的对立面。你应该以恰好相反的想法来阅读《充分理由》一书。一个可运行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套精细设计和不断完善法律体系。

最后一个提示是人类对事物的理解(也就是一些人所称的知识)是一种社会性的努力,也就是说,知识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众人民主参与的过程。实用主义者坚持认为,我们“思考”“我们自认为自己想要什么”的过程,就是“思考出”“我们看起来可能也许会拥有(得到)什么”的过程。人类行动的目标(或终点)并不是预先给定的(所谓“事前的”),相

反,它们是被人们“思考出来的”。

总结一下,我的提示包括:(1)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行动的目的上;(2)使用溯因法去推理;(3)警惕自大的学科霸权;(4)保持头脑清醒,记住经济学不是万能魔杖;(5)认识到市场是嵌入在一个精致而有责任意识的法律体系内的;(6)确定信念的过程(认识过程)是一个达到人们共同分享的理解共识的主动性过程。

我希望,这些提示能够使得本书中译本的读者在阅读确实艰涩的内容时,会相对容易一些。无论做什么探究工作,其成功的秘诀在于,摒弃那种先入为主的“不相信”的偏见。我估计,那些已经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将是最抵制本书观点的人。正如我在书中所提到的,当这些学生读完2到3本研究生水平的微观经济学或博弈论书籍,从而装备上经济学最艰深的盔甲,大有一扫人类经济事物之解释的气势时,他们的信念——实质很幼稚然而却无比自信的信念,也许会增加他们对本书的抵触情绪。如果这种态度确实是非常普遍的话,我的建议是,先把这本书放到一边,10年以后当从标准教科书里学来的所有魔术般的演绎推理法得到的解决方案都被发现不足以应付现实之时,再把它拾起来。就像一瓶波尔多优质葡萄酒,我保证它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历久弥香的。与陈酒略有不同的是,这里陈酿的效应并不是作用在“酒”(本书)上,而是读者——“这瓶酒”的消费者——自身在时光流逝中的生活体验达到了本书作者想要的效果。

最后我建议读者可以多了解一些胡适博士的生平。胡适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曾求学于伟大的实用主义学者杜威门下。在这里,我和本书的译校者、我的好朋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一起猜度着,也许中国的实用主义可以上溯到胡适博士吧。

丹尼尔·W. 布罗姆利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2006年11月

英文版前言

眼下的这本书沿袭着我 1989 年出版的《经济利益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Economic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y*)一书的逻辑。至今那本书仍不断地得到一些同行的肯定和赞许,但它不是一部完全成功的作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它囿于正统的方法,而正统经济学家(无论人们如何理解“正统”二字)认为它过分局限于制度的视角。当时,我的目的是想阐明经济制度的概念(以及内容),并告诉读者如何可能用标准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来评估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然而,我坚持认为对于制度和制度变迁,恰当的评估不应该建立在效率这个循环论证的概念上,而应该建立在更为宽泛的概念上。认识到经济一直处在调整的过程中,立法机构和法院不断修改法律条文以满足新的制度安排的需要,因而,我认为合适的理解制度的方法是将其视为经济的法律基础。这一视角与康芒斯(John R. Commons)的思想、尤其是体现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1924)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我建立的制度变迁模型便是基于康芒斯的“前瞻意志”(prospective volition)和“合理的价值判断”(reasonable valuing)的思想之上的。

在前一本书中我提出,促使大部分制度变迁发生的主要原因可以被认为是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当然,新的技术能够推动制度的变迁,不断变化的相对价格一定也会带来制度的变化。然而,我否认传统的二

分法,即认为制度变迁或者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或者就是纯粹的收入再分配。我认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制度变迁都带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如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保护环境的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在校读书直到一定年龄的法律,禁止性别、种族、宗教歧视的法律,保障工作场所安全的法律等等。我强调,将这些制度变迁归结为普通的效率上的原因在逻辑上是不自治的。理由很简单: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制度一定要有竞争性市场相伴随。因此,我们该问的问题不仅包括工作规则(working rules)及权利(entitlements)或制度的由来,而且包括新的结构产生的原因——这个问题从一般的效率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另一方面,将制度上的重新安排看成仅仅是把收入再分配到那些受到新规则保护的人们手上,这种理解看来也是不正确的。

多数读者或许能够接受“重新配置经济机会”这一观点。然而,他们可能会疑惑于制度变迁何时是出于这一目的,而何时只是为寻租创造了机会。我该如何区分这两者呢?又该如何指导人们辨析出在其他情况下发生的制度变迁的不同之处呢?换言之,我们如何能确信我们看到的制度变迁是属于某一种类型的?自从前一本书出版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某一天的早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它错了,因为它使用了将制度武断地分成两类的二分法,即制度要么提高效率,要么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个问题是错的,还因为它暗含了人们一定能通过某种方式确认“真实”世界的假设。更为根本的是,我提出的“二分法”本身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这点是我在阅读一些书籍的过程中在某一时刻突然领悟到的。这些书籍的作者包括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汉斯·乔阿斯(Hans Joas)、罗伯特·布兰德姆(Robert Brandom)、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威拉德·范·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维特根斯坦、查尔斯·桑德

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慢慢理解了这些著作以后,我意识到早在1989年(或许更久以前)我就是个实用主义者,但当时自己却未察觉。在前一本书中,我做了很多正确的尝试,却没能构造出一套术语和概念体系,没能为自己理解制度的视角提供充分理由(sufficient reason)。

1989年出版的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书中我质疑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设:经济学是一门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我试图停止关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令人乏味的讨论,因为我认为,客观性并不存在于科学之中,只存在于科学家的信念之中。设想一下,一名科学家是否可能凭借现今最好的方法来论述一个观点,并使这个领域内所有同样出色的科学家都同意他?如果能,那么我们说科学家们可能是“客观的”。在方法论的问题上,同样,我做了正确的尝试但没能使用正确的术语与概念,也没能为我的观点提供充分理由。

现在,我已经重新思考了早年关于经济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思想。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思想展开论述了。

致 谢

写这本书的念头源于1998年6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由挪威管理学院(the Norwegian School of Management)主办，我们一行约二十人应邀赴会。会议是为了纪念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经典论文《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一百周年。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制度变迁的目的因(final cause)以及“充分理由”(sufficient reason)的初步设想，其中“充分理由”这个词来源于凡勃伦1909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边际效用的局限》(The Limitations of Marginal Utility)。会议非常令人愉快，会上的讨论激发了我的灵感，并促使我将这些初步的想法做更为详尽的阐释，后来便有了这本书中发展出来的主题思想。我要感谢我长期以来的好友，同时也是经常合作的伙伴阿瑞尔德·凡顿(Arild Vatn)，是他给了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并花费许多时间和我一起讨论经济学、制度以及经济学在为公共政策提供建议中遇到的挑战。

从那之后到本书成形的六年中，我应邀到很多大学做了讲座并从中受益颇多。在绝大多数的讲座中，我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本书中提

出的核心概念。我由衷地感谢那些聆听我的讲座、质疑并努力思考我提出的概念和想法的人们。有时,我的听众对我的观点饶有兴趣但有些疑惑,除了极少数的几次以外,听众们都愿意接受我的观点,即从能动实用主义(volitional pragmatism*)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和制度变迁,他们的评论帮助我更好地论述了本书中的思想。在少数几次的演讲中,有听众自信并坚定地对我说,你错了——这一结论适合于评价一道加法或减法题的答案,但不适合评价一种构造关于人类行为和经济制度的理论的新方法——他们提醒我存在于某些经济学家身上的“过分粘着的特质”:这些经济学家对于自己的所知过于肯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极其坚信自己观点的人往往也是那些迫不及待地指责他人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而是基于习惯来预测人们的选择和行为的人。听众还提醒我,说我对凡勃伦的思想太感兴趣,而这种兴趣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这正如同尼采给予我们的警告:不是谎言,而是坚定的信念构成了我们探求真理的最大的阻碍。对此,法国哲学家查尔斯·赫努叶(Charles Renouvier)做了更为精妙的表述:“确切地说,世上没有确定的事,只有对于这些事确信无疑的人。”(Renouvier, 1859, p. 390)

在过去的三年到四年中,我用这本书的初稿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研究生制度经济学。我要感谢这些课上的学生,他们促使我整理我的观点和论述,使其更易接受并且保持前后一致。

* volition 及其形容词格 volitional 是布罗姆利在本书中非常重要的词。从字面上理解,volition 的意思是“意志”、“意愿”、“选择”、“偏好”等。布罗姆利用这个词来表达他在本书中的核心思想,即制度变迁是行为主体基于对未来的认知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因此,多数情况下本书将 volition 译为“意志”,将 volitional 译为“能动的”。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布罗姆利给予这个词的含义略有不同。对此,本书也会相应地给出不同的译法。——译者注

最后,我尤其要提及三个人。一个是我长期的助手玛丽·约翰逊(Mary Johnson),她一直将我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且生气勃勃,并始终保持着愉悦祥和的神态。另一个是我在芬兰土尔库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urku)的好友朱哈·荷丹巴(Juha Hiedanpää),他参加了1999年夏天我在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开设的制度经济学课程,他发现我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刚刚形成,便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份极长的(并一直在加长的)阅读书目,这些书丰富并深化了我对于许多哲学文献的理解。我非常感谢他的特殊帮助。

我的妻子乔伊斯·伊丽莎白(Joyce Elizabeth)利用清晨散步的时间和我进行了无数个小时见地深刻的交谈,这是我们每天共同享受的最美好的时光。每天日出之前,我们漫步一小时,在春雨、夏暑、冬雪中,我们谈论了许多话题,在这些交谈中乔伊斯帮我写出了一本更好的书,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交谈中她帮助我找到了一种更加惬意的生活。

目 录

1 中文版前言

1 英文版前言

1 致谢

1 序言

2 第一章 前瞻意志

2 充分理由

6 理由和原因的差别

13 目的因

19 结语

21 第二章 手头的任务

21 挑战生范结果主义

23 实用主义的途径

31 能动的实用主义

第一部分 关于经济制度

35 第三章 理解制度

35 解放与限制

38 对个体行动的集体控制

46 结语

48 第四章 制度的内容

48 建构的秩序

57 三类制度

71 制度的经济效应

73 结语

75 第五章 制度变迁

75 普遍认可的真理

80 超越内生性

90 寻找行动的理由

94 结语

第二部分 能动的实用主义

97 第六章 信念的确立

97 从想法到信念

99 演绎式信念

107 溯因式信念

112 归纳式信念

114 结语

116 第七章 解释

116 对解释的紧迫需求

118 充分理由

126 原因和理由

128 结语

130 第八章 生范与预言

130 再论原因和理由

133 为制度变迁寻找理由

143 生范性和预言性的信念

146 结语

147 第九章 能动的实用主义

147 行动的理由

155 作为人类行动理论的能动实用主义

165 作为确定信念的理论的能动实用主义

170 结语

第三部分 能动的实用主义：应用

177 第十章 像实用主义者一样思考

177 寻找理由

177 公共场所吸烟问题

182 疯牛病问题

184 被篡改的基因

187 走向清晰的思考